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项目

李白诗古注本研究

胡振龙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白诗古注本研究/胡振龙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4-07650-3

I. 李... II. 胡... III. 李白 (701~762) —唐诗—注释—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194 号

李白诗古注本研究

作 者: 胡振龙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9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4-07650-3/I·1217

定 价: 16.00 元

序

郝贤皓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齐名的两位最伟大的诗人，但后代学者对这两位诗人的诗歌研究情况却截然不同。就诗集的注释而言，在宋代即有“千家注杜”之说，据董兆宜《黄氏补注杜诗序》云：“近世锲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今存南宋刻《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所汇集的注家有 149 家。而为李白诗作注的在宋代仅有一家，即南宋杨齐贤的《李太白诗集注》，而此书至明代即已亡佚。元、明、清三代，注释杜诗的著作极盛，而注李诗的仅寥寥三、四家。近年来，对杜诗注本进行研究已蔚然成风，“杜诗学”成为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的课题，而对李诗注本的研究却一直无人问津。现在，胡振龙教授的《李白诗古注本研究》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

胡振龙教授此一著作，原为其博士学位论文。2000 年，振龙君南下金陵，投入我的门下攻读唐宋文学博士学位。当时我已 67 岁。按南京师范大学校方规定：我是 1990 年国务院评定的博士生导师，至 70 岁要退休。为避免退休时尚有博士生在学，故 68 岁便不再招博士生。于是振龙君便成为我的关门弟子之一。振龙君入学后学习勤奋，研究深入，学位课程成绩优秀。当讨论学位论文选题时，我考虑自己先后指导培养二十八位博士（包括日本国、中国台湾地区各一名），其中未有以李白研究

为选题者,而南京图书馆收藏李白诗的旧注本资料齐备,且皆为最早刊本,这是研究李白最有利的条件。于是我决定让振龙君以研究李白诗的旧注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振龙君欣然受命,遂每日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埋头苦读,又夜以继日地深入钻研。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篇学位论文。经专家评审,并组成答辩委员会进行答辩,都得到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高质量的优秀学术论文。

首先,振龙君的《李白诗古注本研究》这部著作,从文献学的角度详细考察了李白诗的注释情况,从版本学和诠释学的视角切入,系统地总结历代注家对李白诗的注释方法,注释特点,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缺点。在此基础上,对各种注本作详尽的比勘、分析,不但辨同异,而且论优劣,一丝不苟,细入毫芒,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所以其结论多切实可信。如第五章论清人王琦的《李太白全集》,指出其注的特点是兼收并蓄,采摭繁富,在资料占有方面超过以往任何一部李诗注本,并指出王琦在考证与李白交往的人事方面有许多的发现。更重要的是振龙君总结出王琦在校勘和注释方面的创造性。在校勘方面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综合校勘法等。在注释方面也呈现多元化态势:有比较异同法,点明诗旨法,串讲诗句法,妙解警句法,理清源流法,数据统计法等。这些概括和总结,不仅充分反映出振龙君对王琦注的研究深入透彻,而且对学人治学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对文献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振龙君的这部著作,从学术史的高度,论述历代李诗注本的不同特点,反映各朝代的治学风气和研究方式,阐发时代风气对注释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并揭示历代注家的传承关系。如第一章从传播学入手,考察李白诗歌在唐代的传播情况,实际

上是探讨李诗旧注本的渊源;第二章叙述宋人对李白集的调整与研究情况,阐发李诗旧注本的创辟之功;第三章多角度地研究元代萧士赞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指出萧注深受宋人诗学观念的影响;第四章对明代的三种注本作比较研究;第五章专论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这样从历时性方面系统地揭示了李诗注本的历史演变,实际是李诗旧注的一部简明的学术史。尤其是在论述萧注受宋人诗学观点影响时指出,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沿袭朱熹论李白的观点,二是运用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来分析李诗,三是为李白乐府作解题时,多以郑樵《通志·乐略》为蓝本。振龙君的这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和发明,昭示着李白研究的新方向。

第三,振龙君的这部著作,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同时代的注本作共时性的异同研究,突出代表性注本的典型意义。如第四章论述明代的三种李诗注本,强调指出,林兆珂的《李诗钞述注》是抄袭杨萧注而不注明出处,体现了明代的不良学风;朱森的《李诗选注》、《李诗辨疑》虽在诠释思想和注释体例上有独到之处,但对李诗的辨伪,多为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而胡震亨的《李诗通》则代表了明人注李诗的最高成就。尤其是在为李白乐府的发凡起例上,更是富有创造性,对后代注家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论述都是振龙君独到的见解,非常精辟,富有启发性。

第四,振龙君的这部著作,资料翔实,论证周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从第一手材料入手,阐明自己的论点。并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细致的甄辨,去伪存真。通过各种材料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发掘,形成新颖的观点,表现独特的创获。其中还采用列表和数据统计的方法得出带有范式意义的结论,使考证文字简洁明畅,要言不烦。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

点。

总之,振龙君的这部著作,在资料的抉择、文本的阐释、理论的探讨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境地,其中有许多独到的发明和创见,足以供学术界参资。值此著作付梓之际,略述鄙见,聊以为序。

2006年1月20日于金陵寓所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唐五代人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19)
第一节 李白作品在盛唐的传播	(20)
第二节 中晚唐人对李白的的评价	(26)
第三节 李白诗的别集传播与选本传播	(34)
第二章 宋人对李白集的调整与研究	(42)
第一节 北宋学者整理李白集的成绩与不足	(44)
第二节 南宋学者的注释李诗和编撰年谱	(53)
第三章 论萧士贇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70)
第一节 萧士贇的家世、交游与著述	(70)
第二节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注释动机和诠释 思想	(77)
第三节 萧注对杨注的深化	(84)
第四节 《古风五十九首》的注释特点	(90)
第五节 萧注对宋代诗学的接受	(90)
第四章 明代李白诗注研究	(118)
第一节 朱谏的《李诗选注》和《李诗辨疑》	(119)
第二节 明代注李的典范之作:胡震亨的《李诗通》	(138)
第三节 郭云鹏对杨萧注的删改和林兆珂对杨萧注的 抄袭	(152)

第五章 王琦《李太白全集》:李诗注的集大成之作·····	(165)
第一节 王琦的学术贡献和诠释思想·····	(167)
第二节 征引的繁富与注释的详赡·····	(175)
第三节 注释方式与创新成果·····	(180)
第四节 校勘方法与校勘成就·····	(194)
结语·····	(216)
附录·····	(218)
参考文献·····	(268)
后记·····	(279)

前 言

—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人，武后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中宗神龙元年（705）随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曾为翰林供奉，因称“李翰林”。贺知章誉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李谪仙”。青少年时代在蜀中度过，博览群书，求仙学道，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主要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约在二十五、六岁时，李白出蜀漫游，游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并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与高宗时宰相许圜师的孙女结婚，后又迁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开元十八年（730）曾一人长安寻求出路，但未能如愿。天宝元年（742），因受玉真公主等人的推荐，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但因得罪权贵，天宝三载（744）被赐金放还。此期诗歌创作趋于成熟，代表作有《长干行》、《乌栖曲》、《蜀道难》、《行路难》、《梁园吟》等。离开长安后，李白漫游梁宋、齐鲁，南游吴越，北上幽燕。天宝末，安禄山叛乱，李白应召入永王李璘幕府，王室内让，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肃宗乾元二年（759）三月于途中白帝城遇赦，返回江夏，重游洞

庭、皖南。上元二年(761),六十一岁的李白闻听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于是北上请缨杀敌,半路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寓所。代宗即位,曾以左拾遗一职相招,但李白已离开了人世。晚期的代表作主要有《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李白现存诗将近一千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的抒发内心的抑郁苦闷,有的揭露时政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有的描绘祖国山河的壮观秀丽,有的歌唱人世间的纯真友谊,名篇佳什,美不胜收。而从诗歌体裁来看,李白最擅长乐府歌行体创作,其乐府古题诗和五七言古诗或运用比兴手法,或直抒其情,展开瑰丽奇幻的想象,境界阔大,才力超凡。其五七言绝句音调优美,情感真挚,意境含蓄,韵味深长。李白的律诗数量不多,但别具一格,所作往往不拘格律束缚,有一种飞动之势,豪迈之气。

二

李白和杜甫是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分别被称为“诗仙”和“诗圣”,吸引了后世众多读者的研究兴趣。但从历史上看,杜甫的研究成果远多于李白。即以诗集的注释来说,宋代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代出现了著名的三家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当代学者则对杜诗研究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如许总先生有《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胡可先先生有《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二书考论结合,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烛照,初步建构了杜诗学的体系范畴。郝润华女士的《〈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

书社 2000 年版)一书专门探讨钱谦益笺注杜甫诗所运用的诗史互证方法,对钱注杜诗的特点、价值及贡献进行详尽论述。这说明杜甫研究已进入系统归纳总结的学术研究史层面。反观李白研究,古代的注本屈指可数,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赉补注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朱谏的《李诗选注》、林兆珂的《李诗钞述注》以及清人王琦的《李太白全集》。当代的李白研究成绩斐然,但对李白研究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傅璇琮先生曾指出:“中国古典文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过去往往只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应开展对研究的研究,这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一门学科至可以建立学术史,是成熟的标志,而它的建立又可以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各自总结本学科的研究,就会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由此而总结出在还可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并科学地吸收国外的或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就会使我们的研究方法真正建立在科学的民族的深厚基础上。”^①提高研究素质的前提便是了解前人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有时候后人煞费苦心得出的结论,往往前人早已言之在先。如清光绪年间黄锡珪撰《李太白年谱》,书后附录所谓李白文三篇《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冬夜裴郎中薛侍御宴集序》、《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叙》,^②以为自己首次发现新大陆,

^① 《中国文学大辞典·序》,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据郁贤皓师考证,三文均见于独孤及《昆陵集》,不是李白的作品。详见《李白丛考》第 170 页《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自述说：“三篇皆无意得之，的系太白真作，无可疑者。因思北宋诸贤，搜求极博，俱未曾目睹此三篇。而元明以来，及国朝诸名人，博极群书，笺注太白诗文不遗余力，而三篇之文，亦未曾齿及。今余何幸而得此欤？抑太白之精灵呵护，俾千余年后，三篇文晦而复显，散而复聚，不致湮灭于来世，待时而出者欤？虽然，余之于太白，可谓旷百代以相感，谓有功于太白也可。”^①然而，在黄氏之前，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的陈文述在《颐道堂文钞》卷一〇《与董琴涵论虎邱建太白楼书》已提及《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为李白“作品”，而不见于本集：“太白《宴虎邱山序》见《文苑英华》，而集中不载，此编纂及考订者之疏陋也。”^②对于这一“发现”，陈氏颇为自得，不止一次地提及此事，在《颐道堂诗选》卷八《登怀杜阁拟卜地建太白楼即题香山祠壁并序》中说：“考《苏台览古》见于诗集，《建丑月十五日虎邱山夜宴序》见于《文苑英华》，则太白之至吴较少陵为可信。”同书卷一七《读李太白集知杭州曾为游迹所经，拟营祠宇，书寄钱塘诸故人，即用集中游天竺寺诗韵，有序》云：“前于《文苑英华》得太白《虎邱山宴集序》，议与邑人建祠。”^③又如关于李白几入长安问题，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或主二人长安，或主三人长安（参本书附录《八世纪以来李白研究的十大热点》一文）。许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清代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先期探索，如凌扬藻《蠡勺编》卷二二《李翰林集》一文在叙述

① 《李太白年谱》，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② 转引自裴斐、刘善良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第3册第1102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③ 分别见裴斐、刘善良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第3册第1095、1097页。

李白生平时说：“少以才名，为采访使苏许公所荐，征召不就。开元初，自蜀入京，贺知章以谪仙人呼之。未久，还蜀，遂下荆门，娶于许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间。再入长安，客游山东，与元丹丘辈营石门幽居，携家与居焉。其送杜子美于石门，访范山人于苍耳林，皆此际事。未几，又入长安，应制赋诗，忤贵妃，乃赋《秦楼月》以寓恋阙意，乃游江南池州、会稽，而留家于鲁”^①等等。尽管凌氏的介绍并不准确，但据现存资料，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李白三人长安的首倡者。于此可见，了解前人研究情况对深入探讨相关课题是十分必要的。本论文选择历代李白诗注本作为研究对象，其意义在于：一、了解宋代以来的李白诗注本，总结过去注家的注释方法、注释特点以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透视各个朝代的治学风气和研究方式等等。汲取历代的学术养分，提高研究起点，使李白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二、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考察历代李白诗注释情况，有助于促进文献的搜集整理。通过研究，看一看有哪些注本在今天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应予重新整理或影印。从古籍出版情况看，建国后的古籍出版界似乎对李白诗古注本的价值认识不足，迄今为止只出了清人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一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李白研究尤其是研究史的深入展开。郭绍虞先生在论述清人杨伦《杜诗镜铨》时认为各种杜诗注本均有可资参考之处，后人不应轻易废弃，他说：“杨氏之书（按，指《杜诗镜铨》）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的。没有前人之注，不可能有杨氏之书，而同时没有杨氏之书，反不能显出前人之注之长。前人之注杜固

^① 裴斐、刘善良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第3册第1055页。

然病在凿与繁,但是除了一些无识的注家援引伪作《杜诗事实》一类之书以外,一般都有的一些特点可作参考之资。”^①这无疑是中肯之论。对少而又少的李诗注本来说,我们更不能因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便弃而不顾,相反,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首先,让我们对古往今来有关李诗注本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回顾。明唐汝询《唐诗解》卷首谓:“杜集旧有千家注,而李集惟杨、萧二家。然杜注多伪,李注近烦。”宋代注杜、注韩成风,注李只有杨齐贤一家。萧士赉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序例》中说它:“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东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基于这样的认识,萧氏将杨注进行删节,使后人无从窥见杨注的全貌。因此,历来对杨注的评价极少。相对而言,人们对萧士赉的补注关注得比较多一些,但褒贬不一。明胡震亨《李诗通》卷一谓:“旧有杨齐贤、萧士赉两家注,萧讥杨之疏,乃萧亦芜秽,无所发明。”于是他把杨萧注“兹尽删削”。我们以为胡氏全盘否定的说法和做法有欠公允。另外,明代还有一些学者针对萧士赉注释的未尽之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唐覲《延州笔记》卷一有多条论述:

“李太白《寄远诗》其七曰:‘灭烛解罗衣’,士赉注引谢瞻诗‘开轩灭华烛’、古诗‘被服罗衣裳’、曹植诗‘罗衣何飘飘’以解之,皆非也。按:《史记·滑稽传》淳于髡曰:‘堂上灭烛,主人留宾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薜泽。’李句盖本此乎?”

“李太白《寄远诗》其八曰:‘金瓶落井无消息’,注引古

^① 《杜诗镜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乐府‘金瓶素绠汲寒浆’，未是。按：《玉台新咏·估客词》曰：‘有客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非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李太白《庐江主人妇诗》曰：‘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妇仲卿妻。’齐贤注引《虞衡志》：‘孔雀巢于高山乔木之上’，士贇注引古乐府有《焦仲卿妻词》：仲卿为府吏不归，妻之父母逼嫁，妻守节而死，此引以比之也。萧注视前较知出处，然亦未尽。按《焦仲卿妻词》起句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此诗亦言孔雀东飞也。仲卿母逼遣其妇，府吏送妻还家，相约复迎，后为妻之母兄逼嫁，府吏往谕之，妻守节自溺。今云因府吏不归之故，非事实矣。”^①

明代另一位学者陈绛在指出萧注不足之处的同时，又尖锐批评萧士贇读书不多，知识积累不够充分：

“太白《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诗末句：‘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按《吕览》：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绥而乘，其仆请驰，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命悬于厨。吾命有所悬矣。’白句本此，其时所处又正与平仲类。而士贇未详所出，乃引陶潜词‘乐天知命复奚疑’，渺亡干涉，止傅会‘天命’二字也；且‘乐天知命’又岂书《归去来辞》哉？足云浅妄特甚矣！《金乡送韦（原作‘常’，误）八之西京》末句云：‘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此诗正为送韦（原作‘常’，误）八而致其搔首踟蹰之意，以重其别。故上云：‘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而士贇乃曰：李白此

^① 转引自裴斐、刘善良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第1册第325~326页。

诗,因别友而动怀君之思,可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者!且周书称君者,秦汉以下臣下自以君相命何限,岂必魏阙者哉?亦谬至是乎。他注多类此。昔人谓读书不破万卷,看不得杜诗。如士贇,胸中盖无数卷也。”^①

像胡震亨那样把萧注说得一无是处或者像陈绛那样说萧士贇胸中无点墨,其实都失之片面,有欠公允。倒是后人的评论显得比较公正持平一些。清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评价《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说:“注中多征引故实,兼及意义。卷帙浩博,不能无失。——然大致详赡,足资检阅。”认为萧注是有功于李白集的。今人对萧注的研究并不多,詹锳先生有《〈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一文,详细介绍了海内外收藏的各种版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版刻情况。文章认为:“《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是元、明两代最通行的李白诗集注解,明朝屡经翻刻,甚至当时朝鲜和日本都有汉文翻刻本,可见其影响之大。”^②与大陆相比,台湾学者对萧注的关注稍多,如李嘉瑜先生《元人对李白及其诗的诠释》一文认为:“萧士贇对李白诗的笺释采取的是和《韵语阳秋》(笔者按,宋人葛立方撰)相同的诠释系统,他们都预设了李白诗中必定有关切时政、指涉事实的质素,笺释诠释的目的是要寻求作品语言之外的内容意义,以此种诠释系统解读作品,李白诗几乎句句都是比兴的使用,其所寄托的志意都成了儒家政教伦理上讽谏美刺的情志。”^③杨文雄先生有数十万言的专著

^① 《金罍子》中篇卷七,转引自裴斐、刘善良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第1册第327页。

^②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8册第456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③ 《中山人文学报》第八期第21页,1999年2月。

《李白诗歌接受史》^①问世,分“效果史研究”、“《蜀道难》、《梦游天姥吟》阐释史研究”、“影响史研究”三部分,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历代对李白诗接受以及李白对前人诗接受情况。但该书对历代李白诗注的论述流于表面化而欠缺深入的探究,所据材料也大多出自大陆学者裴斐、刘善良编撰的《李白资料汇编》一书。管见所及,台湾学界和大陆一样,均没有专门研讨萧注的论著。相形之下,日本学者对萧注的研究则比较具体深入,如芳村弘道先后发表《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萧士赧》和《关于元版系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两篇文章,“以翔实的材料,透辟的分析,纠正了自清代王琦以来将玉几山人本系统的翻刻本当作原版系统的错误,并对萧本与宋蜀本、咸淳本的关系及萧本在注释上的特色,提出了新见解,被日本汉学家视为李白研究上的新成果。”^②

明代堪称李白研究的高潮,出现了李白诗歌的选注和全注本,如胡震亨的《李诗通》、朱谏的《李诗选注》、林兆珂的《李诗钞述注》等。但它们的学术价值有高下之别,在后世的流传情况也存在差异。胡震亨的《李诗通》一书,王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颇有发明及驳正旧注之纰缪,最为精确。”^③,此言不虚。朱谏的《李诗选注》一书有自己的特点,也存在不少问题,清孙诒让认为:“其注征引故实,兼及意旨,详简得中,颇便省览,惟每篇必傅以六义,则未脱宋以来讲学家说诗窠臼。其考释

^① 《李白诗歌接受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② 刘崇德《日本学者芳村弘道〈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研究述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72期。

^③ 王琦《李太白全集跋》,《李太白全集》下册第168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